

名刹双黄寺

——清代达赖和班禅在京驻锡地

丹增·丹纳班杂 著
李 健 成



名刹双黄寺

——清代达赖和班禅在京驻锡地

丹迥·冉纳班杂 著
李 德 成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刹双黄寺/清代达赖和班禅在京驻锡地/丹迥·冉纳班杂,李德成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8

ISBN 7-80123-075-2

I. 名… II. ①丹… ②李… III. 佛教-寺庙-中国-北京 IV. B9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 第 22400 号

名刹双黄寺——清代达赖和班禅在京驻锡地

丹迥·冉纳班杂
李 德 成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电话:64027526 邮编:100007)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1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责任编辑:戴晨京 封面设计:杨群 李栋

ISBN 7-80123-075-2/G·23

定价:1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藏语系

高级佛学院建院十周年庆典

题 记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富凝聚力的民族，这种凝聚力从远古走来，又肩负着未来！当今的中国更加迫切需要这种凝聚力！

历史上，古老的藏传佛教文化带着雪域高原浓郁的乡土气息，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植根于燕山脚下，盛扬在京都之中。双黄寺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北京弘扬藏传佛教的中心场所，也成为蒙藏人民倾心内向的象征。今天，古老的西黄寺正重放光彩，迎接新时代！



序

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采，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既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又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可称得上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世界三大宗教也被吸收融合，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外来的佛教文化与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于公元10世纪末叶开始形成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经过发展，融汇了丰富的哲学、历史、天文、历算、医药、艺术、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华民族宗教文化中的一支奇葩。藏传佛教向内地的传播和发展，体现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藏传佛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内部各教派的首领与世俗封建领主相结合，使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二位一体”化，形成了较大的政治经济实力集团，进而逐步形成了西藏历史上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自元代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来，西藏宗教领袖频繁往来内地，

听命于中央政府,体现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为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寺院是佛教徒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上,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更是政教领袖住锡和行使政治、宗教权力的中心。因此,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整个藏学研究的一个切入口。

西黄寺和东黄寺是清初北京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皇家寺院之一。西黄寺是1652年(清顺治九年)清政府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而特意建造的。东黄寺早于西黄寺一年建成,也有幸接待了五世达赖喇嘛。二寺毗连,号曰“双黄寺”。双黄寺,尤其是西黄寺,清代一直担当着接待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贡使的特殊使命,也是蒙藏宗教上层人士晋京时的住地,它既是边疆地区与祖国内地进行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进行政治联系的纽带,在中国近代民族史、宗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十分突出,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由丹迥·冉纳班杂、李德成两位合著的《名刹双黄寺》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双黄寺特别是西黄寺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组织制度、文化习俗、佛事活动和当今现状等,既揭示了寺院全貌,又突出了历史脉络;既肯定了它在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又颂扬了它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方面的杰出贡献,属寺院

研究的上乘之作。古往今来,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介绍双黄寺的专著,此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作者花费大量业余时间,认真查阅了北京各档案馆、博物馆中的大量资料,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分析研究,对已往有关黄寺研究中的某些不同意见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新见解,甚至更正了清高宗时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这种官版名著中关于建寺年代的错误。同样,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黄寺的玷污和破坏情况的叙述,也是已往著作中所少有的。

西黄寺的历史就是爱国爱教的历史,西黄寺的精神就是护国利民的精神。这既是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是藏传佛教界的呼声和时代的召唤,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使藏传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道上迈出更坚定的步伐,为祖国大统一和中华大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曹自强

1997年7月于北京

前 言

在北京德胜门外黄寺大街路北,有一座驰名中外的古刹,它就是清代赫赫有名的西黄寺,即清净化城。从清代顺治年间开始,这里是一片著名的佛教丛林,西黄寺、东黄寺、汇宗梵宇、资福院连成一片,从安定门外到德胜门外,丛林悠悠,僧侣集集,呈现出一派佛光普照的法门圣境。过去的西黄寺比今日宏大,其主体建筑位于安定门外,与兄弟之寺东黄寺等一起绵延数里。

西黄寺之所以如此宏大,如此显赫,是因为它是清代藏传佛教高僧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在京驻锡地,他们时常从神秘的佛教圣地雪域高原来到这里。

时过境迁,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院至今尚存,而在广大的东、西黄寺遗址之上则兴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剩下的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小巧玲珑,庄严肃穆,至今仍松柏翠绿,花草盛开。身穿紫红披单的活佛、僧侣往来其中,于四周现代建筑的包围之中傲然独存,独具特色,为古老的首都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历史上,西黄寺既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中心,

又是一个政治要地,它紧密地将中原地区、藏族地区和蒙古地区联系在一起。研究和了解西黄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将就西黄寺以及东黄寺的历史沿革、寺内建筑、文化习俗及其现状等作详细的介绍。

目 录

序	曹自強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历史沿革

一、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与双黄寺	(2)
二、五世达赖喇嘛离京后到六世班禅大师进京 前西黄寺的历史	(25)
三、六世班禅大师东行及其与西黄寺的关系	(41)
四、六世班禅大师圆寂后到十三世达赖 喇嘛进京前西黄寺的历史	(86)
五、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与西黄寺的关系	(89)
六、民国时期西黄寺的历史及九世班禅 大师与西黄寺的关系	(102)
七、新中国成立后西黄寺的历史	(111)
八、东黄寺的历史沿革	(118)

第二部分 寺院建筑

一、西黄寺的寺院建筑	(130)
二、东黄寺的寺院建筑	(179)

第三部分 寺院组织管理与文化习俗

一、双黄寺的组织与管理	(185)
二、双黄寺的文化习俗	(200)
三、资福院	(212)

第四部分 西黄寺的今天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一、十世班禅大师与高级佛学院	(217)
二、藏传佛教佛学教育从经院式教学到现代学院式 教学的历史性改革	(230)
三、学员教师构成及其他	(237)
附：西黄寺历史大事记	(243)

第一部分 历史沿革

西黄寺自 1652 年(清顺治九年)始建以来,至今已历 340 余年。这期间,西黄寺既经历了高僧频至、香客盈门的鼎盛时期,也遭受了帝国主义入侵的践踏;既有军阀混战的动荡破坏,又迎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东黄寺早于西黄寺创建,它与西黄寺兄弟相伴,风雨同舟,但它最终未能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混战之中生存下来,造成了千古遗憾。

一、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与双黄寺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于1653年(清顺治九年)在北京与顺治帝相见,清政府为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特意修建了西黄寺以供其驻锡之用。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清帝是建立西黄寺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下的各民族交往史和凝聚力。因此,要弄清五世达赖喇嘛和双黄寺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藏族社会及藏传佛教同中原及其他民族的关系。

藏族是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古老民族,公元7世纪初,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50)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落,将都城从山南迁到罗些(即今拉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吐蕃地方政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便与中原地区强大的唐朝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公元641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公元710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704年—755年在位),双方确立了更加亲密的“甥舅合盟”关系,并申明“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甥舅合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

公元1247年,蒙古汗王阔端(成吉思汗之孙)与西藏藏传佛教

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会晤于凉州(今甘肃武威),以此为开端,蒙古开始施政于西藏。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元”,1279年,忽必烈最后灭掉南宋,同时也正式完成了元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统一了全中国。

西藏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又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公元7世纪前后,佛教从印度、内地、西域传入西藏,并受藏地宗教文化的影响,于公元10世纪末叶最终于西藏本土形成了藏传佛教。从公元11世纪开始,藏传佛教又陆续分化出了宁玛派(俗称“红教”)、噶当派(俗称“老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等派别。藏传佛教又称“西藏佛教”、“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教义上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具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藏传佛教,它以经典的译文精确,教法的传承完备,修证的大德众多而称著于世。

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历史上,几乎全民信教的西藏,曾有一些宗教领袖,同时又是政治领袖,他们集宗教、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左右着西藏社会的形势,他们中具有最高宗教地位者同其他民族和政治势力的交往,往往代表着藏族地区政权或藏族社会。

藏传佛教是蒙藏民族共有的宗教,蒙古族是国内各民族中最早接受藏传佛教的民族之一,蒙古族政治势力也是国内最早同西藏进行政治联系的少数民族政治力量之一。蒙藏二民族的政治、文化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他们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阔端与萨班凉州会晤之时,蒙古人便将藏传佛教摆在了各种宗教的上首。元代之初,萨班之侄、被尊为“萨迦第五祖师”的八思巴(1235—1280)先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赐

以印信,并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及藏族地区的事务。由此,终元一朝,历代皇帝均选择高僧封为“帝师”,也使中央政府任用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治理西藏地方的政策延续下来。

延用元策,明代先后册封噶玛噶举派(该派最早采用活佛转世制度)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明史》作哈立麻,1384—1415年)、萨迦派著名高僧昆泽思巴(即贡噶扎西,1349—1425年)、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1352—1435年,也作“释迦意希”,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门徒)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三大法王。

公元1409年,宗喀巴(1357—1419)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祈愿法会,即至今仍在举行的拉萨藏历正月传召法会(藏语称为“默朗钦莫”),俗称“传大召”,并于同年建成了拉萨甘丹寺,从此形成了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意为“善规”)派,因该派僧人在做佛事时均戴黄色僧帽,故俗称“黄教”。继而,其门徒相继建成拉萨哲蚌寺、色拉寺以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被称为“格鲁派四大寺”。公元1546年,哲蚌寺上层僧侣认定年仅三岁的索南嘉措(1543—1588)为上任住持根敦嘉措(1475—1542)的转世,开始了格鲁派的活佛转世制度,索南嘉措也变成了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的领袖。

公元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领袖、明封“顺义王”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相见。这次会见在蒙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俺答汗封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以表示对其尊敬。“圣”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识一切”是藏传佛教对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瓦齐尔达喇”是梵文的音译,意为“执金刚”,是藏传佛教对在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称号;“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整个称号合起来意为:在显密二宗两方面都取得最高成就、超凡入圣、学问渊博如大海一样的大师。这

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由来和开端。这样，格鲁派寺院集团以宗喀巴大师的门徒根敦主巴(1391—1474)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便成为三世达赖喇嘛。

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佛教认为，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首菩萨，表现一切佛菩萨的大悲心，所以是救世之最切者。唐代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简称为观音菩萨。

索南嘉措与俺答汗相会之后，便在蒙古族部落中大力宣传佛教，遂使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民间，并从此扎根于蒙古社会，掀开了历史上蒙古族宗教信仰新的一页。1588年，索南嘉措在内蒙古卡欧吐密地方圆寂。公元1592年，拉萨三大寺格鲁派上层僧侣认定生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之孙云丹嘉措(1589—1616)为四世达赖喇嘛，他是至今历世达赖喇嘛中唯一的一位蒙古人。

云丹嘉措圆寂之后，公元1622年，生于前藏山南穷结地方一个小贵族家庭的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被认定为第五世达赖喇嘛。他是藏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生活在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更迭、西藏地方争权夺势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以格鲁派领袖的身份及其非凡的魄力，外联蒙古，内除异己，巩固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优势地位，控制了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为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并迁都北京，清王朝统治者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央政权易主，一方面，五世达赖喇嘛要朝见新国主，以便清政府承认自己在西藏取得的优势地位，巩固自己的地方权力；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也要联系西藏上层人物，以便顺利接管西藏地区。这样，清政府与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共商国事已提上日程。

实质上，早在清军入关之前，藏满上层人物就有接触。公元17世纪初叶，格鲁派势力腹背受敌，内忧外患加剧。于是，格鲁派